【道教研究】

明清鼎革之际的江南道士

——以无锡《泰伯道院道谱传芳录》为中心

祁 刚

【摘 要】有清一代，无锡梅里泰伯庙道院的历代住持道士纂有碑刻、宗谱、传芳录、乡镇志及文集、诗集等文献传世，使得深入研究宫观历史、道派源流、道士谱系、高功人物等基本问题成为可能。本文借由明清易代的时代契机，假以政教关系、儒道交涉等道教研究的专门视角，解读上述文献，重新审视明清之际以无锡泰伯庙道院为代表的江南道士在地方、教团、国家等不同层面的社会活动和生活面向，深入理解易代鼎革这一宏大历史叙事中的江南道教与地方社会。

【关 键 词】明清易代；江南道教；泰伯庙；传芳录

【作者简介】祁刚，温州大学历史系讲师（浙江 温州 325035）。

【原文出处】《史林》（沪），2021.5.82～89

【基金项目】本文为2014年江苏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“江苏经籍志”(14ZD002)阶段性成果。谨向南京图书馆陈立、周蓉，苏州图书馆孙中旺，无锡市图书馆王进雄所给予的支持和帮助，深表谢忱！

在明清易代的历史研究中，鲜有对道人群体的专门考察。[①]《明遗民录汇辑》有“僧道”“杂号”之什，道士十余人“亦故国遗臣而托于黄冠者也”。[②]此处仅计遗民入道，未及教内怀抱道德、同情遗民的道人。清初江南全真道、正一道兼有遗民入道、道人向遗的情形，且不在少数，乃至有龙门派中兴之说。[③]究其内理：一是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的发展，一是入清后江南士人弃儒从道的心路转变。[④]假此清初江南道人“黄冠儒服”“儒服黄冠”的比较，探讨形象背后身份、心态、行为等多重面向的文化建构，为理解“遗民”“逸民”提供了别样的观察视角和地方经验。无论是受制于忠义观念的“义务性隐逸”(compulsory eremitism)还是依循自我意识的“自愿性隐逸”(voluntary eremitism)，[⑤]方外道士不论家国，其经变处世的言行操守，是否亦持有同样的观念？抑或隐逸出世的行事风格，自成一套“遗民”“逸民”话语？诸如此类问题的探讨，既需明清史、道教史的互见发明，又得从道士、道观内部生活出发，对其生命史、宗教观等作由内而外的观察。

一、“看不见”的道士

梅里位于无锡县东四十里(今无锡梅村)，相传为泰伯奔吴处。横贯境内的伯渎，属大运河江南河的苏锡漕河段，自东向西连接长洲县、无锡县，“渎上有泰伯庙”。[⑥]梅里泰伯庙道院的住持道士先后主持纂修、刊刻了道光《梅里志》(1824)、光绪《泰伯梅里志》(1897)，系以梅里泰伯祠庙及其信仰为中心的乡镇志。

道光《梅里志》载“泰伯故都在锡，庙亦当以在锡者为主”。[⑦]按《咸淳毗陵志》，梅里泰伯庙址原为泰伯故宅，后世因宅建庙。宋人有诗云：“古庙欝崔巍，朱门锁不开。今人不为让，间或乞灵来。”[⑧]位列祀典的泰伯庙在宋代并不以“让”著称，反为民间乞灵香火所崇，是为宋元以来泰伯信仰的地方神明化趋势。明初“泰伯之神”去封号、爵位，复归“至德称让”的儒家伦理。[⑨]洪武十年(1377)，无锡县在城中辟建泰伯庙，以便有司就近致祭。自此以降，梅里泰伯庙“庙隘而圮”。弘治十二年(1499)，新任无锡知县姜文魁重建梅里泰伯庙，为泰伯庙道院创立之始。光绪《泰伯梅里志》对弘治年间祠庙鼎新、道派创设缘由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等,有所交待:

> 明弘治十二年,邑令姜文魁重建大殿寝门,立石表,置祭器,列入祀典,有司春秋致祭;从耆民华嵩等请,延高行道士许元善住持守护。有弘治年无锡县帖谕一道,藏庙中东院,今尚存。按元善字一鹤,明成化十七年出家于丹阳东岳庙,为华用明弟子。[10]

姜文魁重建古庙建筑、重新列入祀典、恢复春秋祭祀的官方举措,本意是表彰先贤祠墓、推行理学实践。[11]面对耆老延请道士住持、守护祠庙的提议和请求,以及随之形成的"设道于祠""附观于庙"的建筑格局,[12]无锡县给帖默认。梅里泰伯庙历经明清两代数次重建,至今犹见明代中叶的建筑风貌。自坊门而入,中轴线上依次为山门、至德殿、玉皇殿、关帝殿。玉皇殿两侧为东、西道院。庙内现存明清碑刻十二通:坊门一通、山门两通、至德殿八通、关帝殿一通。除山门两通漫漶不清,其余碑刻均保存完好。

许元善(一鹤),梅里苏团桥人,成化十七年(1481)在镇江丹阳东岳庙出家,师从住持道士华用明。华用明俗家鹅湖华氏,与华氏耆老同族。可见道院住持人选的物色有地方的、宗族的、师派的多重考虑。住持已定,华以正、蔡氏昆仲、邹氏父子、钱荣等士绅"为悠久计",向道院捐献庙基、香火田。[13]此事报官给牒,檀越、住持勒碑纪事。原碑今立于至德殿东墙,碑文收入《泰伯梅里志》。碑、志互勘,二者落款处有所不同。志中略去了原碑"义民蔡孚、蔡济,住持道士许元善同立"字样。志、碑出入的情况,在《泰伯志》中更为明显。《泰伯志》不仅未见《泰伯庙赡田碑记》(正德十三年,许元善立)、《泰伯庙捐免地基田粮碑记》(康熙八年,邹应源、潘茂真等立)、《重修泰伯庙碑记》(康熙五十六年,朱文瓒立),且其他原碑落款处的住持道士名姓、道号也都略去。《泰伯梅里志》按"旧志删改",未加校核增补。事实上,这些被人为略去而"看不见"的住持道士大多亲历明清易代,其时主理道院,其人其事不可不察。

《泰伯志》《泰伯梅里志》所略道人名姓,除原碑见附,还应见于道院谱牒。清康熙间,住持道士朱玉流"仿儒家谱系之法,作宗支谱","此帙不过二三十页,不假枣梨,书之甚易",然佚。嘉庆间,续修《泰伯道院重辑宗谱》,今亦不传。现存《泰伯道院道谱传芳录》一卷传世(以下简称《传芳录》)。[14]《传芳录》由东、西两院住持道士沈坤、华乾辑纂,别以"道谱""传芳录"两种组成。"道谱"系道观、道士谱牒。"传芳录"可比照嘉靖《华氏传芳集》、隆庆《华氏传芳续集》、乾隆《华氏传芳集》。鹅湖、荡口的华氏为江南望族,谱牒记载不乏祖先事功、名望、文章与诗文。后人从"世系""艺文"等卷,采撷名篇,汇集成册,取"芳名传声"之义,故名"传芳"。[15]"传芳集""传芳录"等作为家谱、宗谱的二次文献,是无锡较为常见的家族文献汇编。照此理解,《传芳录》是以《泰伯庙道院宗谱》《泰伯道院重辑宗谱》作为文献底层,从中辑出高道事迹、名士诗文等,编纂成册。芳声所传,俾使往来谒庙者掌上便览,宣扬本派道人的嘉言懿行、事业功德。借由《传芳录》的辑纂方式、文本功用等,不难察知道院、道士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与积极互动。

二、泰伯庙道谱传芳

《传芳录》十五篇,可归纳为"历史""名望""艺文"三部分(详见下页表1)。一至四篇,为道谱序文及住持道士自序,叙述道派渊源、常住历史等;第五篇为县志辑录,第六篇为泰伯庙道院历代祖师受赠、获赏匾额题录;第七篇为历代高道画像的题记文字,及地方官员、士绅等对祖师、高道的评介;第八至十五篇,为康熙至道光间本派道人诗文。

康熙六十年(1721),曹巖弟曹峻(维岳)出家,礼西院住持朱玉流为祖师。朱玉流因以向曹巖请序。曹序开宗明义,"道家教主,本继袭亦严世代"。"道家教主"即管理天下道门的龙虎山张天师家族。康熙时,张氏叔侄争夺大真人法位,曹巖借题发挥,坦陈道院修谱的动机,"诚为谱系,省旁支之以息门户之争,定单传以衍绵延之绪",并且指出理据,"今师以异姓为骨肉,犹父子也,且奉至德之香火,本遗民亦犹子姓也"。此处的"遗民"指道人遗世出家,而"至德香火"与儒家宗法相仿,可作为道教"法缘宗族"建构中甲乙师徒的伦理纽带。[16]朱序径言,囿于"锡邑道门之派皆系单传",道院宗谱"只就两院分支""唯归(俗)者不录,始终于道房者,无论夭寿概不忍没。每一人下,必书其姓名、法名并及其家世"。循此谱法,可据《传芳录》所辑,梳理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表1 《传芳录》篇目概览

历史	名望	艺文
一、康熙泰伯庙道谱序 曹 巖	五、县志辑录	八、玉流朱祖师遗稿 九、梅鹤谈祖师诗
二、嘉庆重辑泰伯庙道谱序 秦 瀛	六、诸名公赠两院 历代师祖匾额	十、天生华祖师诗 十一、端臣李祖师诗
三、泰伯道院宗谱序 朱玉流	七、诸名公题两院	十二、维岳曹师祖武当进香记 十三、舜音陈师祖诗
四、玉流师祖自序 朱玉流	历代师祖像赞、 题照、诗词	十四、引年钱师祖诗 十五、慎言余师祖嘱咐

说明：曹巖，无锡望亭人，逸士、文人，尝与泰伯庙道士有交游。《羽士梅鹤谈公传》："(谈梅鹤)平生寡交，所与游惟逸僧天钧、曹子伯巖、吕子登莱二三辈。"(《传芳录》)秦瀛，无锡人，秦松龄玄孙，乾、嘉两朝有宦声，历任浙江布政使、刑部右侍郎等，嘉庆十五年(1810)致仕还乡，见光绪《无锡金匮县志》卷20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(江苏府县志辑24)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，第329b页。

出明清之际出家道士概况(详见表2)：

表2中胪列道士十四人，俗家多出自梅里一带的士宦门庭、书香世家，父祖都具有士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身份。鹅湖华氏、后宅邹氏、堠山钱氏等自明中叶道院创设伊始，即为檀越。按其法名字辈，这十四人属道教正一法派的天师张真人派系，[17]其中有八人在易代前后皈依道门。以甲申、乙酉(1644、1645)为限，他们的出家情形分"道而向遗""向遗而道"两种。前者如邹邦弼、周兴让、谈梅鹤，在明亡前夕已出家。鼎革之时，他们持忠义观念而怀抱道德作"义务性隐逸"，或束发而冠，或自杀殉节，努力保持对前朝王统的认同。典型者如周兴让自杀殉节，谈梅鹤"憎其(僧人)髡缁"，冀以道人留发、黄冠、袍服的文化符号，表明矢志忠心。[18]后者如朱玉流、华天生、华衡臣、华汝轩、陈倬云等俱生长于清初，父祖皆历国变。陈倬云祖父陈震生"崇祯癸未(1643)进士，际鼎革不仕"。他们自幼濡染先辈节义，加之当地"一子出家，七祖超升"的风俗，萌发童真入道、追荐功德的出家之想，是依循自我意识的"自愿性隐逸"。

《玉流师祖自序》为朱玉流晚年口述，回顾发心出家以来，料理道院半个世纪、主理法席三十年的道士生涯。朱氏本名文瓒，梅里宋村人，顺治五年(1648)生，雍正初年卒，十八岁出家，礼潘无膺(茂真)为祖师，法名"玉流"。当潘无膺住持时，"乃明季以

表2 明末清初泰伯庙道院出家道士基本情况

姓名	法名	乡贯	家世出身	出家因由	师承、生卒、任职等
邹应源	诚一	西宅	家本素儒，本名家子	遭明季世变，不事科举	明末，札授无锡县道会司
周兴让		本邑	本宦家子，幼读书	弃世而逃名，不求闻达	师厉毓阳，？-1644
谈九凤		谈渡	家无余赀	幼孤，喜隐遁，慕僧之脱然绝俗，而憎其髡缁，因羽客清高且不怪诞	师吕正言，1596-1673
朱文瓒	玉流	宋村	耕读世家，本儒家子	方总角即洒然有出世之想	师潘无膺，真人府知事，1648-1723 康熙四十一年，署无锡县道会司
华鼎诠	科慎	鹅湖	科甲望族	视轩冕如敝履，自幼有出尘想	礼何日高为师，康熙时，札授无锡县道会司
华文焕		香泾	家本素儒	负奇气，落落无所合	真人府知事厅、赞教厅，1644-1721
华汝轩		鹅湖	本名家子	少厌尘网，飘飘然有出世想	师谈梅鹤，真人府知事厅，1667-1753
陈焕章			世宦名家		师杨恺元、朱玉流，1670-?
钱椿		新泾里	儒家子	自少出家	晚署道会司三载，1712-?
张镇	冲镇	东门			师陈倬云
诸涧	汉章	西溪里	本宦家子	早岁即矢志出家	师钱引年
钱璨	通正	东亭	江南望族，世习举子业		师孙锦云，授金匮县道会司
华阳	元明	鹅湖	科甲望族		延经人师，课诸玄嗣
陈韶		坊前		性沉静，好道术	尤善吹笛，世称"长笛仙"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来，自姜尹文魁、倪君珵、华公允诚而后，无有过问者”。[19]经变之后，华氏等传统檀越家族陷入困顿，乏力供养。明末捐修祠庙的华允诚，“顺治五年，以不愿剃发，死江宁市”。[20]迭经动荡，年届耄耋的潘无膺无力住持。年轻的道士朱玉流“乃思外募修造，内谋衣食”，然而“茫茫前路，措手为艰”。康熙八年(1669)，潘无膺羽化，杨慥造元(文瑞)接续法席，朱玉流佐之。二十七年(1688)，朱玉流膺任住持。经他多年经营，使道院“庙貌整肃，廊庑一新”。在他看来，重兴常住乃要“出自众善姓之力”，既要与州县官员、檀越大家广结善缘，也要“黄冠悉力公事”，培植年轻道徒任事用力。清初以降，后者成为道院与华氏、钱氏等檀越故家恢复联系，取得檀施供养、文化赞助的人情纽带。

三、布衣、黄冠与儒服

秦瀛对道士固以先入为主的刻板印象，“余意道士为方外人，不过诵经、礼斗、焚修，以治其身已耳”。直至他序嘉庆《泰伯庙道院重辑宗谱》时，才有所改观，“不意方外人竟有如此卓然可传者”，“夫忠孝廉让诸大节，人世之坊表也”，“皆可致可慕”。秦瀛先抑后扬，着力刻画士大夫心目中“儒服黄冠”的道士形象，强调其符合儒家伦理纲常的正面，不免因此忽视了他们作为道教徒的宗教身份及生活日常。

朱玉流是清初道院承前启后式的关键人物。依他见闻，这些道人“或有性行高洁，亭亭物表者；或有持重严悫，精修道行者；或有创业守成，立功道门者”。性情高洁者，“或恣意诗酒，或隐于浮屠老子，寄其志于高山大河、鱼鸟花草”。道行持重者，以“步虚朝紫皇”“炼液飞玄霜”“采药携青囊”等法事科仪、道教医疗的宗教实践救度世人。守业立功者，带领道侣“修遗殿、振法席、兴玄教”，重振山门和常住，阐教弘法于四方。[21]

明清之际的泰伯庙道士，周兴让最为时人推崇。周氏生平始见于康熙《泰伯庙道院宗谱》“世系”。道光时，邑人秦亮为之书传，后收入《传芳录》。兹据《明殉难羽士兴让周公小传》，摘引如下：

> 兴让周公者，本邑人，系出先贤周子后，本宦家子，幼读书，性高洁，不求闻达，出家至德祠为厉师(毓阳)门人，参究《黄庭内经》《性命圭旨》诸书。是公之为人，有似乎弃世而逃名者。年稍壮，爱游天下名山大川，登临险阻，以畅其怀抱。崇祯壬午，游京师，寓玉皇殿。闻闯逆作乱，公忧愤忘食。闯逆犯阙，公谓侍者曰：“予虽方外人，然不忍见宗庙社稷毁于逆贼之手。吾将从先人于地下矣！”遂北向恸哭再拜，壁间遍书“崇祯圣上”四字，闭户自经。[22]

崇祯末年，周兴让云游京师，挂衲白云观玉皇殿。此行原本打算短暂停留，待中原局势稍安，[23]再沿运河买舟南归。孰料山东多地遭清军“壬午兵燹”，明军与李自成部在河南战事胶着，水陆阻滞。周兴让滞留京中，直至崇祯十七年(1644)李自成攻占京城。“余虽方外人，然不忍见宗庙社稷毁于逆贼之手。”面对王朝倾覆，深具忠义观念的道士周兴让最终选择了自杀。他在自杀之前北向再拜、遍书帝号的臣节行为，不失为内心深处忠君思想的真实流露。

秦亮着意渲染道士周兴让死节殉国的儒服本色。“明季鼎革之际，与余六世祖喜延公同时殉节者，不知凡几。然出于士大夫者居多。公布衣黄冠，逍遥世外，身未尝受国恩，是即遁迹他方，以终余年，公固无负于国人，亦无所责望于公也。”[24]与江南士人自杀殉节相比，逸身方外、心遗社稷的“黄冠儒服”毕竟少数。在曹巖、秦亮等人眼中，饱受儒教、家学的世家子弟在易代之际的出家业道，不单是“弃世逃名”的“遗民”，更是无拘于国家、王朝的“逸民”，表现出文化洒脱、政治忠义的复合形象。周兴让的黄冠儒服以及终其一生的“弃世”，非是出家后受到道家经典或出世观念的影响，恐是家庭出身、门风家训、童蒙教育等主观因素长久以来的潜移默化，以及固有的士人心态与理想主义所致。

同年(1644)，东院道士吕正言获颁“寿官”。明代老人请封“寿官”，须年满八十，并由士人与地方官员之间的权力关系运作，方得州府许可。[25]吕正言俗家锡山吕氏，出家道院五十余年，德隆望尊，族侄吕鸣廷援例请封。吕氏叔侄为此纪事勒碑，碑在今泰伯庙至德殿内。《梅里志》《泰伯梅里志》均未收录该碑。全文抄付：

> 苏郡廪生吕鸣廷，际崇祯甲申，伯吕国珎恩赐“寿官”，荆村高隐，信心种善，每闻念至德古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祠。甲午腊，鹅湖返棹，追及往伯，谒见让王。王殿太古，发愿倡修，弗遑夙夜。丙申谒王，遇洞天季公江宁赴葺，感梦捐金。鸣廷庆福因普集，敬承母、弟，借众就缘，统垂圣鉴。

庙主潘茂真、邹应源，蔡茂宗助修。顺治己亥，吕鸣廷仝弟吕钟、兵宪吕阳拜识，[26]后学孙詖禾拜书。

寿官伯仁慈性笃，庚申、己卯为诰封父国祥、乡饮叔国佑，祝神禳寿，致疾痊愈。尝郡郭侯佳允旌伯匾额，何樟镌。

先弟吕奏嘱男吕进，侄吕遴勒。荆村庠士吕渭飞督建。

碑文中的吕正言(国珎)渐次以寿官、高道、族亲的人物形象示人，不断展开其道、俗生活的不同面向。碑文也反映出明清之际吕氏三代(吕国祥、吕国珎、吕国佑三吕鸣廷、吕奏、吕钟、吕阳三吕进、吕遴)与道院之间既做檀越、又为门图的往来交谊。[27]檀越吕氏捐修殿宇，提供赞助和支持，而道院以道经、科仪等为吕氏族人提供日常宗教服务。例如，吕正言以祝禳、延生等道教科仪为族人祛病延年、祝生祈福。吕氏捐修泰伯庙，是继明末倪珵、华允诚之后，清初第一次大规模的修缮工程。工程从“发愿倡修”到“借众就缘”，直至竣工立碑，前后五年(1654-1659)。此间的江南，恰在清军鼎定之后，哭庙案、奏销案之前，而明季以来地方社会的组织与秩序，始终面临新朝统治的政治压力。

顺治二年(1645)五月，清军占领南京，江南震动。位临伯渎的梅里因处苏锡要津，舟楫往来如云。与锡山吕氏一族渊源颇深的遗民道士吕毖、吕榭父子从太仓泛舟而来，开基鹅湖正心道院。[28]作为明遗民的吕氏父子入道避世，核心人物吕榭(云隐)，为全真律师王常月的亲传弟子，开创了江南龙门支派的冠山道团，[29]矢志“青律设教传道”。

四、走出江南的游历

华用明、许一鹤、周兴让的经历表明，无锡道门至晚于明代中期已经形成外出云游、游历的宗教传统。道人游历所至，一是往山中，对佛道宗教圣地的朝圣巡礼；[30]一是入城中，特别是在帝都京师的交往从游。前者有宗教权威可恃，后者可以凭借世俗权势，二者都是为了联结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，争取到上层精英的支持。

入清后，泰伯庙道院陷入穷困。道士“竖旛击梆募修，经年而不效”，无资游历。吴兴祚知无锡县时(1663-1674)，为“宣上德以化民不争”，倡导泰伯信仰“化争为让，以为至德”。他在任内“崇圣免粮”，蠲免庙基、寺田粮徭，捐修泰伯祠庙、墓道。[31]康熙十八年、十九年(1679、1680)，无锡县接连旱灾、雨灾，“巡抚慕公(天颜)设厂本庙，发赈北延、泰伯共六十图。凡官府往来应酬接送及厂内公事，(玉流)一身任之，不致疏漏，为各上司所称许”。[32]道院执事朱玉流配合官府赈灾，获天师赠匾褒奖。[33]这是道院入清后第一次取得或恢复与江南以外地区的宗教联系，同时也直接促成泰伯道士清初第一次走出江南的游历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此时此处的“天师张真人”落款，止言龙虎山天师府颁授，未循例具名某代天师大真人。天师赠匾的时间节点和落款署名，饶有意味。康熙六年(1667)，五十三代天师张洪任羽化，子继宗(1666-1715)尚在襁褓，教务暂由弟洪偕摄理。康熙十九年(1680)，袭爵未久的张继宗将要启程觐京，而三藩之乱中曾经侵扰龙虎山的耿精忠降清之后，早些时候得旨入京。[34]张继宗是清廷承认的天师继任者，而欲投靠耿精忠的张洪偕企图取而代之。[35]张继宗觐京后，御前“分坛祈雨”成功，击败“觊夺大真人印者”，成为名副其实的“天师张真人”。清朝平定三藩之乱后正式册封天师的政治举动，显示了王朝正统与道门正宗互为联结的正当性。较之此前不定期的朝觐、覃恩，北京宫廷随即与龙虎山正式确立“值纪法员”的人事安排。[36]这一道教官僚组织及其制度在雍正朝时，由来自松江府的法官娄近垣发扬光大。[37]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朱玉流从梅里动身前往福州，向升任福建巡抚的吴兴祚化募缘金。他在行前确知，无锡往来福州均可取道、途经广信府(今江西上饶)。[38]换言之，朝圣龙虎山、参谒天师府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。无论是接受赠匾之后还是新任天师甫立，道院派人专程回访和礼节参拜，都是合情合理的。次年(1684)，朱玉流授为真人府知事。这一法官道位虽无品阶、实职，但在名义上已成为龙虎山道官组织的一员。康熙三十五至四十年(1696-1701)，朱玉流“发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愿各名山进香,历武当、天台、天童、普陀、云台、九华、三竺(三天竺)、句曲、齐云、虞山诸胜境”。频频朝山游历,表明了道院与佛道圣地之间的宗教联系得以恢复,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一时期道院经济不断好转。值得注意的是,朱玉流首选武当或以武当为首的朝山进香,除受明代旅行、流行文化影响,[39]仍然恪守明代尊崇真武的道教传统,即便真武祀典入清后不复如前。

继朱玉流后,东院道士华天生开始远游。华天生晚年“至京师,诸贵显及海内名士,多乐与之交”,“时青阳锦树观恽师方光明殿行走,欲留之”。[40]“青阳锦树观”乃常州府江阴县青阳镇锦树道院,[41]去梅里泰伯庙道院不远。明万历间,沈鹤江创建锦树道院,传沈桐山,再传恽养深,[42]即“青阳锦树观恽师”。大光明殿是清代皇家道观,“光明殿行走”借指恽养深的道官身份。康熙五十一年(1712),沈桐山以法员充职宫廷十二年,深得崇信道教的雍亲王赏识。[43]沈桐山年事渐高,召弟子恽养深进京随侍。供职于京师道录司的恽养深,以道术奉事和硕雍亲王府。[44]彼时京中道教,沈桐山、恽养深、华天生俱为常州府同乡,道缘同出江南正一派。正是沈师、恽师引介,华天生得以布衣交游京中。次年(1713),华天生离京返乡,倾资捐修泰伯祠墓。这一义举很快得到张继宗肯定。[45]龙虎山天师府的迅速反应,与沈桐山、恽养深来自北京的教内举荐和支持有关。在明清交替之后地方秩序、政教关系更新确立的过程中,朱玉流、沈桐山等最先一批走出江南的道人,出行机缘尽管不同,但都受到了“江南—龙虎山—北京”之间的道教官僚组织及其宗教地理格局的支配和影响。

尾声

无锡梅里泰伯庙道院,作为区域性的中心道观、社区空间的公共结点,自明代中叶创设以来,即与官员、檀越、士人、信众等长期保持着广泛而密切的联系。[46]康熙《泰伯道院宗谱》虽是“历叙从前艰辛甘苦,以为诸徒孙劝”,但就道人们生于明末、长于清初的生活经历、出家心路而言,其文本动机毋宁说是对家国变故、鼎革易代的历史回望与现实回应。

囿于道院谱牒亡佚,作为其二次文献的《传芳录》可补道院碑铭、乡里志书不足,亦将道人名姓落实于地方生活当中,为理解明末清初的江南道教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人物群像。泰伯庙道院道士易代经变时的不同抉择及其人物形象——自杀殉节、束发衣冠、交结檀越、云游他方,大体能够反映出明末清初江南道士的全貌或主流。与遗民道士儒服黄冠式的忠节高行相比,这些黄冠儒服的泰伯庙道士自愿隐逸,转而投身地方。“盖已出家,则当各尽本教事宜,以求无负山门,不负檀越,则亦不辱本姓宗支,以答生我之恩矣。”[47]垂暮之年的朱玉流在谱序中作如是说。

从周兴让京中殉节到华天生辞京归老的世道流转,正是明清易代、交替的七十年。借由周兴让、施道渊、沈桐山、恽养深、华天生以及朱玉流、吕正言、吕榭等道人此间在教门内外的行止,[48]或可审视明清鼎革之际江南道教的起伏。一方面,改朝换代的军事、政治活动对地方社会的冲击,特别是奏销案对江南士绅阶层的打击,中断了檀越与道院之间的经济联系。另一方面,三藩之乱以后清代国家政教关系的确定,“值纪法员”为江南道教因应、化解鼎革之际的地方困境提供了转机。位于天师、皇帝之间的江南道士得以率先“选充法员,入京值纪”,借此为地方宫观、本派丛林争取来自教内、朝廷的资源和支持。

注释:

①关于明清易代,可参见赵园:《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;岸本美绪『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: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』、東京大学出版会、1999年;杨念群:《何处是“江南”:清朝正统观的确立与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;陈宝良:《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;冯贤亮:《士人生活的变革:明清之际的社会与政治演替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9年第1期;洪丽珠:《何为遗民:宋元以降夷夏视阈下的易代士人研究》,《四川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19年第3期等。

②谢正光、范金民:《明遗民录汇辑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,第1348页。

③见任继愈:《中国道教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,第651—653页。尹志华:《明遗民入全真道考》,《清代全真道历史新探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,第26—35页。

④见贺晏然:《弃仕入道——朱长春的玄栖生涯与道教思想初探》,《宗教学研究》2018年第3期;《屠隆的道教活动与晚明江南文人道教环境》,《宝鸡文理学院学报》(社会科学版)2020年第1期。贾凌雁:《明清之际的道教与黄虚堂弃儒从道》,《西部学刊》2019年第4期等。

⑤Frederick W. Mote, "Confucian Eremitism in the Yuan Period," in Arthur F. Wright ed,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Civiliza-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

tion, Stanford: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75, pp. 252—290.

⑥王仁辅:《无锡县志》卷2,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年版,第71—72页。

⑦《梅里志》卷2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,第91页。

⑧史能之:《咸淳重修毗陵志》卷14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,第699册,第129页。

⑨魏文静:《明清时期江南泰伯信仰的儒家化:以苏、常二府为中心的考察》,《东南大学学报》(哲学社会科学版)2008年第5期。

⑩《泰伯梅里志》卷4,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,第344页。

⑪王健:《十五世纪末江南毁淫祠运动与地方社会》,《社会科学》2015年第6期。

⑫据明正德十三年《泰伯庙赡田记》,"翼以旁室,命道士许元善居之,以奉香火。"《泰伯梅里志》卷4,第348页。江南家族延请僧道住持祠庙的传统,参见何淑宜:《香火:江南士人与元明时期祭祖传统的建构》,台北稻乡出版社2009年版。

⑬《泰伯梅里志》卷4,第348—349页。

⑭《泰伯庙道院宗谱传芳录》,光绪印本,苏州图书馆藏。

⑮"前作后述、孝义贞烈,历历可指如前日事,使人仰其芳声,如兰熏桂馥……信乎! 其可为传芳也。"见嘉靖《华氏传芳集》,《无锡文库》第三辑,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,第14—16页。

⑯张雪松:《佛教"法缘宗族"研究:中国宗教组织模式探析》,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。

⑰伍一鸣:《道教在无锡流传的概况》,《无锡文史资料》第18辑,1987年,第148—149页。

⑱相关研究见林丽月:《故国衣冠:鼎革易服与明清之际的遗民心态》,《奢俭·本末·出处——明清社会的秩序心态》,台北新文丰出版社2014年版;陈宝良:《朝代更替与华夏民族服饰文化心理变迁——以元明、明清鼎革为例》,《艺术设计研究》2019年第1期。

⑲吴兴祚:《泰伯墓碑记》,《梅里志》,第231页。倪珵,梅里坊前人,为倪瓒之兄倪玨五世孙,生平见《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》,顾宪成:《泾皋藏稿》卷17,《无锡文库》第四辑,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,第198—200页。

⑳《梅里志》卷2,第89页。华允诚事详乾隆《华氏传芳集》,《无锡文库》第三辑,第454—455页。

㉑顾景行:《题让王庙潘、杨、吴三羽士像》,杨逢春:《采芝堂五师歌》,俱见《传芳录》。

㉒秦亮:《明殉难羽士兴让周公小传》,《传芳录》。

㉓"十四年夏,山东盗起……大盗李青山众数万,据梁山泺,遣其党分据韩庄等八闸,运道为梗。"见《明史》卷276《张国维传》,中华书局1974年版,第7064页。

㉔秦亮:《明殉难羽士兴让周公小传》,《传芳录》。

㉕邱仲麟:《耆年冠带——关于明代"寿官"的考察》,《台大历史学报》第26期,2000年12月。

㉖"吕阳字全五,无锡人,进士,顺治间以荐举,授下江防道。"光绪《黄州府志》卷13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(湖北府县志辑14)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490b页。

㉗有关"门图",参看高万桑:《江南本土仪式专家授权及管控(1850-1950年)初探》,潘君亮译,王岗、李天纲主编《中国近世地方社会中的宗教与国家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,第35页。

㉘见《梅里志》卷2,第90页。

㉙闵一得:《金盖心灯》卷2,《藏外道书》第31册,巴蜀书社1994年版,第198—199页。

㉚相关研究见梅莉:《明清时期武当山朝山进香研究》,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。

㉛吴兴祚:《泰伯庙捐免地基田粮碑记》,碑在今泰伯庙至德殿,《梅里志》《泰伯梅里志》均未收。

㉜《玉流师祖自序》,《传芳录》。

㉝"功用莫测,康熙庚申,天师张真人赠。"《传芳录》。

㉞"(康熙十九年)夏四月十九日,靖南王耿精忠疏请陛见,得旨:耿精忠着来京。"《清圣祖、清世宗、清仁宗实录选辑》(合订本),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版,第106页。

㉟细谷良夫:《雍正朝的正一教——以法官娄近垣为中心》,张泽洪译,《宗教学研究》1994年Z1期。

㊱"命随觐法员吴士行等三人留京供事,三年一易,在京日给廪饩,往返给驿马。既复加增二员,为定例。"见娄近垣:《龙虎山志》卷6,《藏外道书》第19册,第475a页。

㊲曾召南:《娄近垣及其与正一支派的关系》,《中国道教》1995年第1期。

㊳明末清初时,无锡至贵溪的路线,可参徐霞客浙游、江右游相关行程,见丁文江编《徐霞客游记》卷3,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,第1—14页。

㊴陈宝良:《飘摇的传统——明代城市生活长卷》,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,第213—215页。

㊵《天生华公小传》,《传芳录》。

㊶《道教大辞典》"沈法师"条,"青阳"条误作安徽省池州府青阳县,又将沈开恒、沈桐山混为一谈。详见中国道教协会、苏州道教协会编《道教大辞典》,华夏出版社1994年版,第570页。

㊷鄂尔泰:《锦树道院记》,光绪《江阴县志》卷24,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(江苏府县志辑25),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,第650b—651a页。

㊸"(世宗)赐号'铁笛真人',以青旸锦树道院为其(桐山)栖真地,诏年希尧扩而新之,构殿宇,置田亩,鄂尔泰为之记。"光绪《江阴县志》卷21,第625b页。有关清代宫廷道士研究,参看高万桑:《清代北京的宫廷道士》,方立天主编《宗教研究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,第272—306页。

㊹《锦树道院记》,光绪《江阴县志》卷24,第651a页。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恽养深手抄《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》两种,见朱家溍主编《历代著录法书目》,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版,第268页。

㊺《天生华公小传》:"道士意不惬,孑然南归,竭赀助修泰伯祠墓。五十二年,天师授知事厅,晋赞教厅。"《传芳录》。

㊻郑振满、陈春声主编《民间信仰与社会空间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。又江南宗教与地方社会的新近研究主要有李天纲:《金泽:江南民间祭祀探源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;《民俗曲艺》("江南地方宗教"专辑),台湾施合郑民俗文化基金会,2019年总204期等。

㊼《玉流师祖自序》,《传芳录》。

㊽清初施道渊的活动,详见吴伟业等:《穹窿山志》,《藏外道书》第33册,相关研究,参看高万桑:《清初苏州的道教与民间信仰——穹窿山施道渊的个案》,张安琪译,曹新宇校,《清史研究》2015年第1期。

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.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s://www.rdfybk.com/